

# 蘇聯的新政治思維與對外政策

畢英賢

## 前言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蘇聯外交部召開了一次駐外使節會議。會中，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發表講話，表達了蘇聯外交的「新思維」。①其實，在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戈巴契夫已經提到。他說，不僅在內政上已經形成了轉折形勢；對外關係也是如此。他認為，世界局勢的轉變極為深刻與劇烈，因此對其各項因素必須重新認知和綜合分析；在核子對抗的情況下，應以新途徑、新方法和新方式對待不同社會制度間、不同國家間及不同地區間的相互關係。②這些就是蘇聯外交新思維的雛形，經過一年多的發展，大致形成一套理論。同時，蘇聯在對外政策與外交實施為上，確實也有了轉變。

本文擬概括蘇聯外交新思維的內涵，進而檢視蘇聯對外政策的實踐，研析其外交目標，並評估其成效。

## 新政治思維的內涵

在蘇聯文獻中，「外交新思維」，大多時間以「新政治思維」代替，有時又用「對外政策新哲學」，不過其內容所涉及的，皆是同一件事。戈巴契夫在「二十七次」的講詞中，關於對外政策提出下列幾個新觀點。③

註① 當時蘇聯未公佈講話的內容。今年，蘇聯發行蘇聯外交部通報 (Vestnik MID SSSR) (半月刊)，在第一期中發表了其講話的摘要。參見，大公報，

一九八七年八月九日，第二頁。

註② 戈巴契夫，「蘇共二十七次大上政治報告」，共產黨人 (Kommunist)，第四期，一九八六年，第六頁。

註③ 同註②，第十八、十九、五四、五六頁。

一、全球問題須共同解決。如今，單靠一個國家或一羣國家已不能解決全人類與全球問題；必須由大多數國家作全球性的合作，作建設性的協同努力。這是現時代的迫切要求。

二、強調各國間相互依存性。戈巴契夫指出，現代發展的真正的辯證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體系間的競爭與對立，同時也在於世界各國日益升高的相互依存性。

三、對當代世界局勢，他歸納出數點原則性看法。第一，單靠軍事技術裝備已不能確保防禦，維護國家安全已逐漸變成爲一項政治任務。第二，在蘇聯與美國關係中，安全必須是相互的；就世界關係言，必須是全面的。第三，蘇聯依然認爲美國是「軍國主義的火車頭」，但也承認「這個偉大國家的國家利益」。第四，世界正處在急劇的轉變過程中，誰也沒有能力使現狀永恆不變。

四、贏得軍備競賽乃至贏得一場核子戰爭已經是不可能之事。繼續軍備競賽以及把軍備競賽擴及到太空皆會加速核子武器的積累與完善。總有一天，政治家的理智與意志將無能爲力。易言之，如果軍備競賽不終止，即使「平衡」也不能成爲抑制戰爭的因素。真正的對等安全是維持最低限度的戰略平衡，而不是最高限度。

五、批評布里茲涅夫時代的僵硬政策。戈巴契夫間接批評布里茲涅夫說，不能靠一兩次密集的和平方勢就可以解決國際安全問題。祇有始終不渝的、有計劃的與堅持不懈的努力才可獲得成就。外交政策的延續性並非重覆去做已做過的事。在評估本身的實力時，必須精確；在決策時，必須自我抑制與有高度責任感；堅守原則與立場，表現策略上的彈性，準備作出彼此都能接受的妥協，而最後目標不是對抗，而是對話與相互諒解。

以上是戈巴契夫「新政治思維」的概要。④其後不久，蘇共中央書記、國際部部長、前駐美大使杜布萊寧（A. Dobrynin）在蘇共機關刊物共產黨人上發表論文，闡述戈巴契夫所提出的「新政治思維」概念。⑤他的陳述較之戈巴契夫報告坦率與清晰。他爲「新政治思維」列出六項基本原則。

- 一、在核子時代中生存的互賴性含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 二、軍事對抗的水平必須予以降低，同時應遵守「平等與對等安全」原則。⑥

註④ 戈巴契夫首次使用「新政治思維」(New political thinking)係在一九八六年元月十五日所提出的廣泛裁軍計劃中。他說，必須以「新的、大膽的態度」及「新的政治思維」對待軍備競賽，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聲明」，消息報 (Izvestia)，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六日，第一頁。

註⑤ 杜布萊寧，「爭取世界安全，迎接二十一世紀」，共產黨人，第九期，一九八六年，第十八至三十一頁。

註⑥ 「平等與對等安全」用語，至目前爲止，是蘇聯在裁軍限武談判中所堅持的原則。對美國而言，問題在「對等安全」上。就實際意義言，「對等安全」就是，在美蘇雙邊裁軍問題，應考慮蘇聯所面對的其他方面的威脅，如中共、英國及法國的獨立核子力量。這個原則的實際意義是，蘇聯所擁有的武裝力量應等於其所有敵對者的總和。

三、僅依賴軍事技術手段不可能確保安全。

四、國家安全概念與國際安全概念已不可分割；因此，對蘇聯與美國而言，安全是共同的。

五、在對外政策上，必須有較高水平的彈性；並且準備作出「合理的妥協」。

六、解決國際安全問題需要一個多面向的途徑，包含軍事、經濟、政治，以及人道等要素。<sup>⑦</sup>

杜布萊寧在其外交理論的文章中，基本上是發展與綜述戈巴契夫的看法。不過，他提出兩個值得注意的觀點。第一，他在好幾處呼籲蘇聯的科學家與科學院士們，多多研究軍事政治問題；對查證軍備管制協定與銷毀核子和化學武器的技術層面，多多作出科學的分析。他還提出一個動人的建議，科學家與世界政治和經濟學者應共同研究，如何把軍事經濟轉移到民用生產軌跡上。第二，他指出，「形成與運用新政治思維」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按照他的看法，必然會出現尖銳的衝突、討論與分歧。<sup>⑧</sup>關於後一點，杜布萊寧顯然是有感而發的。蘇聯學者與官員在這方面的爭論並未公之於世，但必然是存在的。茲就軍方與意識形態方面，分別敘述於後。

關於戈巴契夫的「新政治思維」以及「防衛性軍事指導原則」，<sup>⑨</sup>蘇聯軍方至少有下列幾點反應。第一，新政治思想是衰弱的表現。第二，新政治思維強調裁軍，忽視國防力量。第三，在這種非對抗性的新政治思維中，存在著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潛力滿不在乎與「天真的和平主義」。<sup>⑩</sup>

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sup>⑪</sup>主任陸軍大將李瑟契夫爲了支持戈巴契夫的新政治思維，並對前述軍方意見著文加以釋疑，於今春發表。他的論點如下：第一，一個由強大國家所提出的愛好和平的倡議，不是衰弱的跡象，而是現時代不可或缺、新政治思維的表現，對人類命運最崇高責任感的表現。第二，蘇共政策特點之一是，使和平的努力與防衛的努力作有機的統一。李瑟契夫說：「在今天，國防開支、軍事人員的數量、武器與軍事技術裝備的質與量絕對按照防衛祖國與集體保衛社會主義成果的需求而定。」<sup>⑫</sup>第三，蘇聯從未忽視帝國主義集團的威脅性，因此蘇共不斷採取必要的措施以維持蘇聯武裝力量現代化的水平。不過，他

註⑦ 杜布萊寧，「爭取世界安全，迎接二十世紀」，第二十四至五頁。

註⑧ 同註⑦，第二十六、二十七至二十八、二十五頁。

註⑨ 李瑟契夫(A. Lizichev)，「十月與列寧關於保衛革命的教訓」，共產黨人，第三期，一九八七年，第八十八頁。

註⑩ 尼可爾斯(T. Nichols)，「軍人與新政治思維」，自由電台研究公報(Radio Liberty Research)，第八〇期，一九八七，第一至三頁。

註⑪ 蘇聯陸海軍總政治局屬蘇共中央委員會，是共黨在蘇聯軍中的領導組織，推行軍中的黨務與政治工作。

註⑫ 同註⑩，第八十六、八十八頁。

警告說，未來戰爭的代價高得難以估計。<sup>⑬</sup>

此外，新政治思維所主張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世界體系的相互依存性，與原來的兩大體系的對抗性發生了矛盾。易言之，在意識形態與對外政策的相互關係中也有了理論上的缺陷。在蘇聯，這些問題也必然引起爭辯。於是，支持戈巴契夫的學者提出了「外交政策新哲學」，用以解釋新政治思維。蘇聯科學院院士普瑞馬可夫（Ye. Primakov）說，世界各地的社會革新是全人類客觀的要求。但是，這種革新（革命或進化）的機制是由每一個國家內部矛盾所帶動的。他指出，蘇共政權成立之初，列寧就反對革命輸出。因此，在核子時代中，尤須排除革命輸出。國家與國家的關係不應該是世界社會主義與世界資本主義決定勝負的競技場。<sup>⑭</sup>

普瑞馬可夫的「外交政策新哲學」就是以新的概念架構去理解當前的安全問題。他提出四個重點：第一，在確保各國安全上，必須以政治措施為主；透過政治手段以增進諒解，建立互信，進而發展國際安全體系。第二，任何改變皆應考慮到軍事因素。在目前，軍事成份仍是確保兩個敵對方面維持安全的重要手段；但軍事指揮原則應以防止全面毀滅性戰爭為目標。第三，一國人民安全不能犧牲他國安全而獲確保。第四，對外政策新哲學必須防止蘇聯與美國對抗陣面的擴大；易言之，區域衝突不應擴大為美、蘇間的敵對鬭爭。<sup>⑮</sup>

去（一九八六）年初以來，蘇聯出現頗多有關新政治思維的文章，<sup>⑯</sup>此處不擬一一引述。不過，這類論文都以戈巴契夫的觀點為基礎，或加以闡揚，或加以補充。綜析各家言論，新政治思維可分為三個主要部分。第一，使蘇聯對外政策恢復活力，其方法是，一方面排除先前對外政策的若干缺點，另一方面在執行對外政策時運用彈性。第二，向蘇聯最高領導階層灌輸一些新概念，諸如，全球問題與相互依賴。第三，重新估量國家安全資源。關於這一點，至目前為止，至少有三點結論：（一）軍力對等將不是防止戰爭的政治與軍事前提；（二）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不可分開；（三）對國際安全的確保必須運用多種手段，不能僅靠軍事手段而已。<sup>⑰</sup>

## 新政治思維的實踐

註⑬ 同註⑫，第八十六頁，八十八頁。

註⑭ 普瑞馬可夫（Ye. Primakov），「對外交政策新哲學」，真理報，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第四頁。

註⑮ 同註⑭。

註⑯ 例如，美加問題研究所長阿巴托夫（G. Arbatov，共青團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第三頁），外交部長謝瓦納澤（真理報，四月二十三日，第一至二頁），蘇聯科學院副院長費多賽耶夫（P. Fedoseev，哲學問題，一九八六年五月）等皆有相關論文發表。

註⑰ 格立克漢（G. Glickham），「蘇聯對外政策新方向」，自由電台研究公報，一九八六年九月六日，附冊第二卷，第六、七頁。

蘇聯的新政治思維與對外政策

去年五月，戈巴契夫在蘇聯駐外使節會議上發表講話，對外交實踐提出了三個要點：(一)全盤重新評估蘇聯對外政策的優先順序；(二)應用新的談判策略，以糾正前外長葛羅米柯（被號稱「不先生」）所造成的蘇聯在國際社會上的不良形象；(三)消除外交部內部的腐化現象。<sup>18</sup>顯而易見，這些結構性與技術的改革旨在與外交新概念相配合，使新政治思維的精神更能灌注到外交實務中去。

在戈巴契夫統治下，蘇聯外交部的主要官員已大部分更動。部長與兩名第一副部長全是新人；九名副部長之中，一半以上是新人。所有駐外大使三分之一以上被更換，駐各大國大使幾乎全是新面孔。此外，外交部本身部分改組。原有的遠東第一司與第二司以及東南亞司已分別改為「亞洲社會主義國家局」、「東南亞國協局」、「大太平洋合作局」；新成立「裁軍問題局」、「新聞局」及「人道與文化聯繫局」。此外，蘇聯對外政策的優先順序也作出部分調整，正如蘇共二號人物李珈契夫所說，蘇聯外交已不是祇注重對美國的關係。<sup>19</sup>毫無疑問的，蘇聯對外活動仍以美國為中心，但比以往重視其他地區，其優先順序大致如下：(一)歐洲，其中東歐優先於西歐；(二)亞洲太平洋地區，其中以中共與日本為重點；(三)第三世界，其中以中東、中美洲及南非為主。同時，在第三世界中，蘇聯開始重視溫和國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印尼、泰國等）的關係。

就對外關係而言，蘇共宣稱其「二十七次」通過的黨綱，乃是一個「和平綱領」。因此，連續不斷的外交和平攻勢成為戈巴契夫統治以來最明顯的特徵。以下，列舉近年來戈巴契夫在推展和平攻勢的有關措施，也就是蘇聯以新政治思維為基礎所提出的一些倡議。

一、片面停止核子試爆：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為美國以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四十週年，蘇聯片面宣布停止核子試爆，並要求美國響應。美國置之不理，蘇聯曾四度延長停止試爆期間，至一九八七年元月一日始正式終止，一共停止試爆五百二十天。去年八月十八日，戈巴契夫宣布最後一次延長試爆期限時曾發表演說向蘇聯人民解釋他如此做的理由：第一，多年來核子武器的積累已經夠多，而軍備競賽未曾減緩，為使人類免於核子浩劫，應及時採取行動；第二，蘇聯的決定係基於對和平的支持，與對人類文明的責任；第三，現代世界情勢極為複雜，各國互賴性增高，要確保自身的安全，也必須考慮他國的安全<sup>20</sup>。

二、向美國提出全毀核子武器建議：去年初，蘇聯提出十五年内消滅核子武器計劃。這個計劃分三個階段實行。第一階段，在最近五至八年內，蘇聯與美國各把戰略核子武器投送器縮減一半，保留的核子彈頭不超過六千個。同時，雙方不得發展、試驗

註⑱ 見註①。

註⑲ 李珈契夫(E. K. Ligachev)，「沿著十月方針，本著革命創造精神」，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七日，第二頁。

註⑳ 戈巴契夫，「電視演說」，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九日，第一頁。

及部署太空攻擊武器。在此一階段內，蘇美完全消除雙方在歐洲地區的中程飛彈，停止一切核子試爆。第二階段應在一九九〇年以前開始，為期五至七年，蘇美以外的核子國家開始裁減核軍備，蘇美則繼續第一階段的裁核協議，進一步銷毀中程核武，並凍結核武系統。然後，各核子國家全部銷毀戰術核武，全面禁止核試爆。第三階段，在一九九五年之前開始，銷毀一切核子武器。一九九九年底，全世界已經沒有核子武器。②

三、倡議召開赫爾辛基式的「亞洲太平洋會議」：蘇聯早在一九五八年已倡議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③十多年之後，一九六九年，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再度提出，④但未見多大回響。戈巴契夫上臺後，首先建議組織一個「全亞洲論壇」，後又建議召開一個「太平洋會議」。去年七月底，他建議在日本廣島召開一個赫爾辛基式的「亞洲太平洋會議」，討論亞太安全問題。他並列出五個具體計劃：(一)調整區域性問題；(二)防止核子武器擴散；(三)降低美、蘇雙方在太平洋海軍艦隊的活動；(四)在亞洲大量裁減武裝力量與傳統武力；(五)討論建立互信與不使用武力的問題，並制訂相關措施。⑤戈巴契夫的海參崴講話與建議標誌著蘇聯新亞洲政策的開始。今年七月中旬，二十一個亞太地區國家的共黨代表在外蒙舉行亞太地區共黨會議，其主題是「爭取無核世界，爭取人類生存」。⑥這會議顯然為戈巴契夫的新亞太政策推波助瀾。

四、提出「全球性雙零方案」：七月二十一日，戈巴契夫接見印尼自由報 (Merdeka) 記者的訪問時，親自宣布，蘇聯願考慮到亞洲國家的不安，願意銷毀全部中程飛彈。⑦稍早，美蘇在日內瓦會議中曾同意，雙方各保留一百顆中程飛彈的核子彈頭，美國留置於本土，蘇聯則部署於其亞洲地區。此刻，蘇聯願意不保留這些飛彈；但其條件是，美國不但要作出相同的決定，而且要銷毀戰術核武(中近程)飛彈。戈巴契夫說，這就是「全球性雙零方案」。

五、建立無核、無暴力世界：去年十一月，戈巴契夫訪問印度，其主要目的在加強蘇、印關係，阻止美、印關係的發展，並推展蘇聯對亞洲的外交。在訪問期間，雙方曾簽署了四項文件，其中以「德里宣言」⑧最為突出。這個宣言提出建立一個「無核、無暴力世界」的十項原則：(一)和平共存應為國際關係之普遍性準則；(二)承認人類生命為最高價值；(三)無暴力是人類共同生活之

註① 「戈巴契夫總書記的聲明」，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六日，第三頁。

註② 真理報，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第五頁。

註③ 消息報，一九六九年六月十八日，第一頁。

註④ 「戈巴契夫在弗拉吉米爾伏斯托克的講話」，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第三頁。

註⑤ 「真理報」，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一頁。

註⑥ 真理報，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第一頁。

註⑦ 「關於無核與無暴力世界原則的德里宣言」，真理報，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一頁。

基礎；(四)以相互諒解與信任取代恐懼與懷疑；(五)承認與尊重各國政治與經濟獨立之權利；(六)把用於軍備之資源改用於確保社會與經濟之發展；(七)保證個人和諧發展之條件；(八)人類物質與知識潛力應用以解決全球性問題；(九)以國際安全取代恐怖平衡；(十)無核無暴力世界需要具體與迫切之裁軍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到本世紀末，澈底銷除核武庫；不容任何核武器進入太空；全面核子禁爆；禁止製造任何新形式的集體攻擊武器；禁止化學武器並銷毀現有庫存；降低裝備與軍力的水平。如今，「德里宣言」已成為蘇聯常用的外交詞彙。

六、宣布防衛性軍事準則：今年五月底，華沙公約組織國家在東柏林舉行高峯會議，戈巴契夫親自出席。會後，發表了「華沙公約組織國家關於軍事準則的聲明」。<sup>②</sup>蘇聯又稱它為「防止戰爭的準則」或「防衛性軍事思想」。在蘇聯軍事教條中，一向重視攻擊。如果從這則聲明及其內容看，蘇聯的軍事思想似乎已作出調整。這個防衛性的軍事準則包括：華沙公約國家(一)如未受到攻擊，將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聯盟採取軍事行動；(二)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三)不對任何國家有領土要求；(四)不視任何國家、任何人民為敵人；(五)維持最低水平的武裝力量，以足夠擊退任何外來侵略為原則；(六)維持戰備以防突襲；(七)武力不超過所需。蘇聯集團國家基於上述軍事指導原則，共同追求下列目標：全面禁止核子試爆；禁止並銷毀化學及其他集體屠殺性武器；縮減歐洲傳統武力的水平；嚴格監督一切裁軍協議；建立無核武無化武區；解決敵對軍事集團(華約與北約組織)之間的衝突。

七、主張建立國際經濟安全體系：蘇聯認為，沒有一個國家，不論多麼強大、資源多麼豐富，若不與國際社會建立多邊關係，就不易順利發展。一個採取孤立政策的國家，其經濟可能停滯不前，科技落後，生產效率下降。易言之，在當前的世界條件下，各國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因此，蘇聯呼籲並積極推動建立一個「國際經濟安全體系」，其基本原則應包括：(一)在國際經濟關係中，消除一切歧見，放棄經濟封鎖與經濟制裁；(二)共同努力解決國際債務問題；(三)重建世界經濟秩序；(四)節省軍事經費以爲第三世界窮困人民謀求福利；(五)共同努力，解決全球性經濟與社會問題。<sup>③</sup>五月底，華沙公約國家高峯會議通過一項「關於克服不發達狀態和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sup>④</sup>的文件，誓言願爲上述目標而共同努力。

八、加強對外經貿關係：蘇聯爲配合外交新策略，加速國內經濟發展，已決定擴大對外經濟與貿易關係。爲此，蘇聯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與實際活動，譬如：(一)積極爭取參加國際經濟組織，例如，蘇聯曾要求參加「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有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界銀行」等；(二)改組對外經貿體制，從今年起七十個大型企業可直接對外進行經濟活動；(三)外貿組織一律實

註② 「華沙公約參與國家關於軍事準則」，真理報，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第一至第二頁。

註③ 波格當諾夫(O. Bogdanov)，「國際經濟安全概念」，載於蘇聯對外貿易(月刊)第二期(一九八七)，第二、三頁。

註④ 「關於克服不發達狀態和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真理報，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第三頁。

行經濟核算制，自籌資金，自負盈虧，追求利潤；(四)容許外國資金在蘇聯境內組織「聯合企業」，但蘇聯方面所持之股份不得少於百分之五十一；(五)促使蘇聯集團的「經濟互助委員會」與西方的「歐洲經濟共同體」之間建立正式關係，目前此一問題已獲若干進展；(六)大力開拓國際市場。<sup>⑳</sup>

九、建立和睦的「全歐洲之家」：蘇聯聲言，「全歐洲之家」的居民能否和睦相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國際局勢。在這方面，蘇聯的政策是，消除歐洲的一切核子武器；開始歐洲大陸非軍事化的實際過程，把國防力量維持在最低、最合理的數量上。要達到這個目標，除了完全銷毀蘇聯與美國在歐洲的短中程飛彈外，尚要建立嚴格的監視體系、解決戰術核子武器問題、裁減北大西洋與烏拉爾之間的傳統武力。蘇聯表示，將依「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的規定與西歐鄰居相處，並儘力建立一個全面的、互惠的合作架構。<sup>㉑</sup>

十、降低北極地帶的軍事對抗水平：戈巴契夫於今年十月二日在蘇聯穆爾曼斯克(Murmansk)海港發表演說，建議「使地球的北極成爲和平區，使北極地帶成爲和平地帶」。因此，他呼籲各有關國家進行談判，以降低在該地區軍事活動的幅度。戈巴契夫提出六點具體建議：(一)使北歐成爲無核區；(二)限制北歐附近海域的海軍活動；(三)合作開發北極資源；(四)共同對北極地帶進行科學研究；(五)合作維護北極的自然生態；(六)蘇聯願開放北海，供外國船隻行駛。<sup>㉒</sup>

## 新外交策略的圖謀與成效

戈巴契夫內倡「改造」(Perestroika)，對外提出新政治思維。改造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新政治思維是追求和平的國際環境的手段。易言之，新政治思維是實踐蘇聯國內政策的外交策略，而非對外政策本身的質變。

蘇聯劇烈修改其外交策略有其內、外因素。

從七十年代中期起，蘇聯經濟停滯不前，情況日益惡化。戈巴契夫上臺後，除進行經濟改革、加速經濟發展外，別無選擇。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國內經濟發展需要一個穩定與和平的國際環境。因此，加速經濟發展是蘇聯對外策略轉變的基本因素。此外，試圖縮減龐大軍事支出，也是一個因素。以往，蘇聯不斷全力維持軍力成長，使消費與基本投資無法大幅增加。同時，由於經

註⑳ 請參閱畢英賢撰，「蘇聯加強對外經濟關係」，問題與研究，第二十六卷第九期，民國七十六年六月，第二二至三〇頁。

註㉑ 海外(Za Rubezhom)週刊，第二十一期，一九八七，第一頁。

註㉒ 「戈巴契夫的講辭」，真理報，一九八七年十月二日，第三頁。



濟投資的不足致使勞動生產力無法適當地成長。結果，在近十多年來，蘇聯對外擴張的成就，無助於內部問題的解決。因此，戈巴契夫力圖在限武問題上取得成就，以便內部縮減軍費。在這方面，戈巴契夫雖然遭到軍事工業黨官僚及蘇聯武裝部隊若干保守的高級將領的反對，但他仍能作有效的控制。今年五月，西德青年駕駛一架單引擎小型飛機從赫爾辛基起飛，越過蘇聯嚴密的防空網，安然地非法降落在克宮大門口的「紅場」上。蘇共上下震驚，戈巴契夫乘機整頓高級軍事指揮將領，不次升遷亞索夫（D. T. Yazov）為國防部長取代梭科洛夫（S. L. Sokolov）。亞索夫，六十三歲，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的見解與戈巴契夫相近，自然會全力支持戈巴契夫的國防政策，使新政治思維的實踐減少很大阻力。

蘇聯有意減緩軍備競賽的速度，是其調整外交策略的另一個因素。由於軍事技術的不斷進步，任何國家皆難長期維持軍事優勢，於是形成加速度的軍備競賽，尤其在美、蘇兩大超強之間，你追我趕，永無休止。但是，蘇聯的經濟基礎與一般科技水平遠不如美國，難以持久，於是發動了一系列和平攻勢，以減緩軍備競賽的速度。

從另一方面看，在七十年代內，蘇聯軍力迅速成長，達於與美國粗略相等的形勢。此時，蘇聯利用軍事力量直接或間接地大力推行擴張政策，至一九七九年底揮兵入侵阿富汗而達到高潮。蘇聯的擴張行為雖有所獲，但已引起世界多方面的指責，徒使東西關係緊張，而蘇聯外交因此陷入困境。戈巴契夫上臺後，力圖改善外交形勢，而採取了若干新穎措施。

概括言之，蘇聯在新政治思維的指導下所發動的一連串的外交和平攻勢，旨在達成下列目標：追求國際和平環境，專心從事內部改革；降低軍事費用，大力發展經濟；緩和與穩定東西關係，引進先進科技；阻止或拖延美國「星戰」計劃，使蘇聯在這方面不致落後太遠；全力鼓吹無核無暴力世界，以改善蘇聯的國際形象；進而以非軍事手段擴張勢力，其首要目標則在亞太地區。

一年多以來，蘇聯宣傳機器不斷宣揚「新政治思維」或「對外政策新哲學」；另一方面，自從戈巴契夫上臺後，發動密集的和平攻勢。如今，這一策略已產生明顯的效果，茲舉例說明如左：

在重大國際問題上，蘇聯人民的看法與政府相近。今年二月，蘇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曾作過一次民意調查，取樣一千零六十六人，就十六個重大國際問題徵求答案，統計結果，民衆意見與政府大致相同。例如，關於「美、蘇間一旦發生核子戰爭，將沒有勝利者」的問題，同意者佔百分之八十九，不同意者佔百分之四，沒有意見者百分之七；關於「核子武器一旦進入太空，就會提高意外使用核子武器的危險」的問題，同意者佔百分之九十五。<sup>34</sup>受訪者是在沒有威脅的情況下作答，所以這項統計結果可

註<sup>34</sup> 關於蘇聯對亞太政策，參見，木村（Hiroshi Kimura），「蘇聯在太平洋的焦點」，共產主義問題（*Problems of Communism*），第三十四卷第三期，一九八七年五月、六月，第一至一六頁。

註<sup>35</sup> 伊凡諾夫（V. Ivanov），「無核世界與社會意識」，共產黨人，第五期，一九八七年，第一一七—一一九頁。

信度相當高；可見，蘇聯的和平攻勢在其國內已取得很大的效果。

西歐輿論大部分肯定蘇聯的裁軍政策。今年七月，英國獨立報（*Independent*）綜合報導西歐九個國家（英國、西德、義大利、比利時、荷蘭、法國、希臘、瑞士及瑞典）的民意調查結果。在六千多名被訪的西歐民衆中，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對蘇聯的「和平與裁軍政策」持肯定的看法，祇有百分之十九的人持否定與懷疑的看法；百分之六十七的民衆認爲，在減緩軍備競賽上，蘇聯做得比美國多。<sup>②</sup>美國前駐聯合國大使寇爾克派翠克（Jean Kirkpatrick）擔心，西歐將疏離美國。她舉例說，當一九七四年時，有百分之十七的英國人認爲，英國的外交政策不要緊靠美國；一九八四年時，此一數字升到百分之三十二；到一九八六年時，已達百分之四十三。同時，百分之五十八的西德民衆認爲，應當同等對待美國與蘇聯。<sup>③</sup>

反核運動興起，多處出現「無核區」或「和平區」主張。最近幾年來，世界反戰、反核運動普遍發展。一方面，參與此一運動的人數愈來愈多；另一方面，很多出名的政治家、政黨領袖、學者與專家加入了這個運動，使其更具影響力。而反戰運動的組織也日漸增加，例如，目前美國就有五千七百個。<sup>④</sup>在一九八六年中，克里姆林宮接待了世界各國的四百六十四個反戰運動的代表團；並應外國反戰團體之邀派遣一百二十四個代表團出國訪問。<sup>⑤</sup>各國反戰、反核團體共有五個主要目標：（一）銷毀核子武器；（二）阻止「星際戰爭」，（三）禁止核子試爆；（四）裁減常備兵力。很容易看出，這些目標完全符合蘇聯當前的外交策略。近年來，國際科學家亦經常出席反核會議。這些現象自然地助長了戈巴契夫的和平攻勢。此外，各地主張無核區或和平區的聲浪不斷出現，如南太平洋、東南亞、印度洋、北歐等。這些運動或主張對美國都形成掣肘作用。

就實際外交關係言，蘇聯對西方關係已普遍改善。有關美、蘇銷除中、近程飛彈的「雙零方案」，在短期內可能達成具體協定；歐洲戰術飛彈及美、蘇戰略武器縮減問題，也將加緊討論。如無意外事件發生，美蘇另一次高峯會議將在年內舉行。此外，蘇聯與西歐領袖間也經常互訪，經濟關係亦有改善。中共與蘇聯關係已有明顯的改善，尤其是經濟與文化方面。日本與蘇聯關係在今年初曾出現解凍現象，但未有進一步發展。在第三世界方面，蘇聯全力經營東南亞與南太平洋，且已取得初步成效。對中南美洲，蘇聯亦已展開積極活動，許多國家願與蘇聯改善關係，戈巴契夫準備在近期內對中南美洲作一次歷史性的訪問。在中東，蘇聯外交活動也頗有進展，與溫和阿拉伯國家以及以色列間逐漸溝通。戈巴契夫的新政治思維，已受到多數國家的讚賞。

註② 眞理報，一九八七年七月二日，第五頁。

註③ 珍·寇爾克派翠克，「歐洲正漂離美國而去」，中國英文中國日報（*China News*），一九八七年六月二日，第二頁。

註④ 朱可夫（Yu. Zhukov），「反戰運動——新傾向與前景」，國際生活（*Mezhdunarodnaya Zhizny*），第三期，一九八七年，第三至四頁。

註⑤ 同註④，第二七頁。

蘇聯的國際形象已獲改善。戈巴契夫在國內厲行「改造」與「民主化」，推動「公開」政策；對外推行務實外交、發動持久性和平攻勢，使不少國際人士相信，蘇聯已放棄擴張主義，誠心追求和解。於是有人說，「和解的第二階段」已經來臨。<sup>④</sup>

## 結 論

從以上的分析與檢討，至少可以得出下列數點結論。第一，蘇聯領導階層，至少戈巴契夫本人及其追隨者，對國際事務與國家安全持有較新穎的看法。他們相信相互依存與相互安全。可以看出，戈巴契夫在對外關係上，比較務實，不意識形態拘束。第二，蘇聯外交作風的改變，並不等於外交目標的改變。例如，蘇共的主要目標，「世界社會改造」（也就是世界革命），是不變的，而且尋求新的、「文明的階級鬭爭形式」以推行社會主義，也就是設法「從資本主義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蘇聯學者說，「和平革命也是革命」。和平革命的目標是，首先消滅資本家的政治統治，然後再祛除其經濟勢力。<sup>⑤</sup>第三，「新政治思維」不是一個單純的宣傳口號。兩年來，蘇聯在外交領域內所採取的種種措施足可說明，蘇聯希望在最近期間內形成一個更切合實際的、更有效的對外政策。

註④ 艾姆克 (Horst Emke)，「和解的第二階段」，原載紐約世界政策雜誌 (World Policy Journal)，引自海外，第三十七期，第六至八頁。

註⑤ 普里馬克 (E. G. Pimakov)，新思維與世界社會改造的前景，哲學問題 (Voprosy Filosofii)，第六期，一九八七年，第八十四頁。  
(本文作者現為本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 中共文字改革之演變與結局

汪學文 著

中共對於「文字改革」，謀略多端，內容複雜，其主要目的在廢棄漢字、篡改歷史，進而破除中華傳統文化。本書詳述中國文字之結構與演進，並對中共「文字改革」工作，從理論與實際，分別加以論析。全書約廿餘萬字，二十五開本，計三百頁，每冊實售新臺幣二百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歡迎惠購。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行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號帳戶